

On the History
of Thoughts in Republic
of China
(Sequel)

○ 郑大华 著

民国思想史论

(续集)

民国思想史论

(续集)

郑大华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思想史论：续集/郑大华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9

ISBN 978-7-5097-1650-2

I. ①民… II. ①郑…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民国
IV. ①B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67073 号

民国思想史论 (续集)

著 者 / 郑大华

出 版 人 / 谢寿光

总 编 辑 / 邹东涛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网 址 / <http://www.ssap.com.cn>

网站支持 / (010) 59367077

责任部门 / 人文科学图书事业部 (010) 59367215

电子信箱 / bianjibu@ssap.cn

项目经理 / 宋月华

责任编辑 / 张晓莉

责任校对 / 崔雪梅

责任印制 / 郭 妍 岳 阳 吴 波

总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行部

(010) 59367080 59367097

经 销 / 各地书店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排 版 /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9.5 字数 / 497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1650-2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要进一步加强民国思想史研究（代前言）	（1）
--------------------------	-----

第一编 清末民初的思想演变	（1）
---------------------	-----

一 《走向共和》离历史究竟有多远	（1）
------------------------	-----

（一）清末民初的历史脉络和主线	（1）
-----------------------	-----

（二）主要人物的评价问题	（5）
--------------------	-----

（三）《走向共和》离历史究竟有多远	（11）
-------------------------	------

二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	（13）
--------------------------	------

（一）中国传统民族主义的演变	（14）
----------------------	------

（二）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传入	（19）
----------------------	------

（三）民族主义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25）
------------------------	------

（四）清末民初：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	（32）
---------------------------	------

三 论“民生主义”的内容及其评价	（38）
------------------------	------

（一）“民生主义”的内容	（39）
--------------------	------

（二）“民生主义”的评价	（49）
--------------------	------

第二编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五四思想界的影响	（52）
----------------------------	------

一 民族主义思潮在五四前后的兴起和发展	（52）
---------------------------	------

（一）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和发展的原因	（53）
-------------------------	------

（二）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和发展的表现	（60）
-------------------------	------

(三) 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和发展的特点	(72)
附录：五四民族主义与三大思潮之互动	(84)
二 《改造》与五四社会主义之传入	(102)
(一) 《改造》的宗旨、作者群和读者群	(104)
(二) 《改造》对各种社会主义之译介	(111)
(三) 《改造》与五四社会主义之论战	(120)
(四) 《改造》译介社会主义之主要特点	(126)
三 也谈五四后梁启超的思想属性	(135)
(一) 文化取向上的保守主义	(137)
(二) 政治取向上的自由主义	(144)
(三) 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的疏离及其原因	(147)
 第三编 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别	 (153)
一 东方文化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153)
(一) 东方文化派的形成及特征	(154)
(二) 东方文化派与新文化派的文化论争	(163)
(三) 东方文化派的历史评价	(175)
二 论甲寅派的保守主义思想	(187)
(一) 《甲寅周刊》复刊与甲寅派的形成	(189)
(二) 经济思想：反对工业化，主张“以农立国”	(196)
(三) 政治思想：反对代议制，提倡业治与科道制	(202)
(四) 文化思想：反对新文化运动，提倡复兴文言文和 传统礼教	 (208)
(五) 时人对甲寅派的评析	(218)
三 学衡派与白璧德新人文主义	(231)
(一)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与学衡派的形成	(232)
(二) 学衡派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的译介	(239)
(三)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对学衡派的影响	(247)

第四编 九一八事变与思想界的应对	(264)
一 理性民族主义：“九一八”后的天津《大公报》	(264)
(一) 反对“一战”，主张抵抗	(265)
(二) 反对依赖国联，主张理性外交	(271)
(三) 反对国共内战，建立抗日“统一战线”	(278)
(四) 与《东方杂志》和《独立评论》之比较	(283)
二 中国知识界对国联调处九一八事变的不同反应	(288)
(一) 对国联调处的不同态度	(289)
(二) 对国联报告的不同评价	(293)
(三) 对国联决议的不同期待	(296)
(四) 反应不同的原因分析	(298)
三 “九一八”后中国民族主义的新变化	(307)
(一) 民族主义学理的新构建及其影响	(307)
(二) 文化民族主义的高涨并走向成熟	(325)
(三) 自由主义者的民族主义认同	(338)
第五编 三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	(347)
一 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	(347)
(一) 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原因	(348)
(二) 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表现	(353)
(三) 社会主义思潮兴起的特点	(364)
二 论苏联“一五计划”对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影响	(372)
(一) 对“一五计划”的关注和评论	(373)
(二) “苏俄热”的兴起	(378)
(三) 学习苏联呼声的高涨	(384)
附录：30年代初18种刊物发表的有关苏俄文章的 篇目及作者	(390)

三 《益世报》与 30 年代的宪政运动	(401)
(一) 宪政运动的前提与原则	(401)
(二) 对国民党训政理论和体制的批判	(405)
(三) 对公民的选举权与言论自由权的捍卫	(408)
(四) 对宪法草案的解读与批判	(413)
(五) 宪政及其替代品——宪政运动的内在困惑	(417)
 附录 1949 年后留在大陆的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	(421)
冯友兰：认同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421)
梁漱溟：对马克思主义的“吸取、利用与儒化”	(427)
熊十力：对马克思主义的排拒	(436)
 代后记：“咬定青山不放松”	
——郑大华教授访谈录	(441)

要进一步加强民国思想史研究

(代前言)

2006年，我的《民国思想史论》出版后，得到学术界的好评。《光明日报》、《教学与研究》、《广东社会科学》、《中国图书评论》等报刊以及一些网友纷纷发表文章，肯定该书对民国思想史研究的贡献。李喜所教授在其书评中，称它是“一部会思想的思想史”，认为读书“会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凝聚主体意识；二是注重梳理源流；三是突出使命感的解析（见2008年1月13日《光明日报》“史学版”）。有的学校还把它作为研究生教材或博士生考试参考用书。为了感谢学术界的厚爱，我又从近几年自己写的或和学生一起写的学术论文中选出17篇，编成《民国思想史论（续集）》，交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根据文章的内容，本书分为五编：第一编，清末民初的思想演变；第二编，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五四思想界的影响；第三编，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派别；第四编，九一八事变与思想界的应对；第五编，三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所收录的文章，都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过（个别文章曾收入《民国思想家论》，中华书局，2006），收入本书时，个别文章的题目或内容作了一些修改或充实。《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一文，因超出了民国的时间范围，作为附录收入。另外，将《历史教学》2006年第9期“著名中青年学者访谈专栏”刊载的访谈我的文章《“咬定青山不放松”》，作为“代后记”，放在书后，通过它，读者可以了解我的为学历程和我的治学方法及其他。

如我在《民国思想史论》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大陆的民国史研究起步较晚，直到197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民国史研究组（即现在的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的前身），大陆

的民国史研究才算真正开始。大陆的民国史研究起步虽晚，但发展较快，近一二十年来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就相继出版了多卷本的《民国人物传》、《中华民国大事记》以及《中华民国史》。然而检视这些成果，大多集中于民国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党派史（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等方面，专门研究民国思想史的著作并不多，到目前为止尚未出版一部通史性的民国思想史著作。就研究队伍来看，客串者不少，但真正一心一意长期从事民国思想史研究的人不多。这不能不说是民国史研究的一大憾事。这种状况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恐怕与大陆学术界对思想史的重视不够有关。

柯林伍德在其名著《历史的观念》一书中曾提出过一个重要的史学思想，即“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尽管我们可以对柯氏的这一思想提出各种各样的批评，譬如说他过于夸大了思想的作用，而没有注意到思想背后的物质力量，等等，但他对思想史在历史研究中之重要地位的强调，无疑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我们一般认为，历史研究的任务无非有两个方面或层次：一是回答历史“是什么”；二是回答历史“为什么”。换言之，第一个任务是还原历史，第二个任务是解释历史。或者说，第一个任务是描述历史现象，第二个任务是探求历史发展的规律。相比较而言，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难度也更大一些。而第二个任务，一般而言，属于思想史研究的范围。我们通常讲历史的继承性，照我的理解，也就是思想或文化的继承性。因为历史给我们留下的，一是文字的历史，亦即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如我们的“二十五史”；二是观念的历史，亦即长期形成的一些思想观念，如我们传统的“三纲五常”、“忠孝仁义”；三是物化的历史，如中国的长城、故宫，埃及的金字塔。无论哪一方面，能为人们所继承的，只能是蕴涵其中的思想或文化，而非历史本身。就是物化的历史，实际上也已成为一种思想或文化符号，或者说是思想或文化的象征。否则，物化的历史还有什么意义？！

既然思想史在历史研究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们在研究民国史时就应加强对民国思想史的研究。实际上，我们今天遇到的、讨论的、感到困惑的许多思想文化问题，也都是民国时期的人们曾遇到过的、讨论过的、困惑过的问题。对民国思想史的研究，能为我们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提供有益的借鉴。为此，在这里我真诚地希望学术界能关注、重视民国思

想史研究，真诚地希望更多的民国史研究者，尤其是青年朋友加入到民国思想史研究队伍的行列，真诚地希望出版界能出版更多的民国思想史著作。也正是出于推动民国思想史研究这一目的，我才抛砖引玉，斗胆地把自己近十几年来所写的部分民国思想史文章结集为《民国思想史论》、《民国思想史论（续集）》先后出版，尽管它们还很不成熟。

本书的出版，首先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领导和同事们，是他们为我提供了优良的研究条件和工作环境。感谢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已故教授林增平先生和我的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龚书铎先生，是他们把我引领进了学术研究的神圣殿堂。感谢我的父母对我的培养以及为培养我所付出的心血。感谢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对我的事业的长期支持和对我的关爱。更要感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领导，尤其是杨群先生和宋月华女士，这是继《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民国思想史论》之后，他们出版的我的第三本著作。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我只有以更大的努力、更多的成果，来报答所有关爱我、支持我、帮助我的人们，并真诚地希望能继续得到他们的关爱、支持和帮助。

我在湖南师范大学的 2008 级研究生刘新庆、尚贺兵、贺哲人，2009 级研究生方兰兰、刘旭光、黄单华、李会梅等同学帮我校对了所有原文，在此一并致谢！

我再次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对本书提出批评和指正，因为我深信，正常的学术批评，是帮助作者进步、促进学术繁荣的最有效的途径之一。来信请寄北京市东城区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近代史研究所，邮编 100006；或湖南省长沙市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邮编 410081；也可以发至我的电子邮箱：zhengdh2002@yahoo.com.cn。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郑大华

2009 年 12 月 30 日

第一编 清末民初的思想演变

一 《走向共和》离历史究竟有多远^{*}

目前，59集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正在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黄金时段播出。我是该剧的审片之一，所以有不少朋友问我，这部收视率很高的电视剧离历史究竟有多远？剧中所涉及的事件和人物与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是否相符合？就这些问题，我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清末民初的历史脉络和主线

《走向共和》反映的是清末民初的历史。如何反映这段历史，首先有一个对这段历史脉络和主线的把握问题。除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如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和1915年日本提出的旨

* 该文是2003年5月初应《光明日报》之约而撰写的，后来因故未能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已看清样），而是分三期刊载在《光明日报》“内参”《情况反映》2003年第169、170和171期上。刊载时，《光明日报》在文前加有一按语，全文如下：近年来，历史题材的影视剧频频上演，而清宫戏又堪称主力。不管是号称“戏说”还是自诩为“正说”，其影响都不小。与此同时，史学界批评影视界歪曲历史、误导观众的声音也扰攘不息。但从实际效果看，影视界倒也干脆，只用“艺术”两个字就轻轻避过史学家的批评，有的甚至妄言要“气死历史学家”。编者认为，既然观众对“历史剧”那么感兴趣，编导们还是多给观众一点准确的历史知识为好。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非常浓烈的历史感的民族，中华儿女对过去的历史知识也很感兴趣，而媒体又是当今社会很多观众借以获取历史知识的重要渠道，因而制作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在考虑“商业卖点”的同时，兼顾“教化功能”应该须臾不可忘记。不久前，央视一套播出的《走向共和》是一部长达59集说历史的大戏，自播出以来，引起不少议论。一些读者就该片的有关历史问题向编者咨询，并希望我们约请专家谈谈这段历史，评评这部戏。于是，我们约请该剧的审片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郑大华博士写了《〈走向共和〉离历史究竟有多远》这篇文章。希望这篇文章能对读者有所帮助。

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和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如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尽管有它的落后性，但就其性质而言，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外，这一时期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主要有三种政治力量：一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先是受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刺激，发动和领导了具有资本主义改革性质的戊戌变法，但戊戌变法最后因慈禧发动政变而失败了。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流亡日本，成立保皇会，一方面继续宣传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及平等、自由思想，一方面则从事“保大清”、“保光绪”的活动。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他们又积极开展立宪运动，并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围绕要不要反清革命等问题展开激烈论战。二是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先是成立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和“华兴会”，从事反清革命活动，1905年又在革命小团体的基础上成立了具有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中国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他们一方面对清王朝进行武器的批判，先后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一方面又以笔和纸为批判的武器，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展开论战，宣传反清革命思想。1911年，他们发动和领导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后，他们为了维护辛亥革命成果又与袁世凯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三是以慈禧为代表的清政府和袁世凯的北洋势力。慈禧于1861年通过辛酉政变开始“垂帘听政”，执掌清廷大权。1889年光绪亲政，但清廷实权仍然掌握在慈禧手中，清政府内部因而形成帝后两党。甲午战争后，以光绪为首的帝党支持戊戌变法。戊戌政变后，光绪被囚，慈禧重新“垂帘听政”。义和团运动中，她利用义和团运动的“扶清灭洋”，对外宣战。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她逃到西安，下令屠杀义和团，宣布“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与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1901年后，为了挽救清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她被迫实行新政，1906年又宣布预备立宪。1908年慈禧病死，三年后清王朝被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被推翻后，袁世凯的北洋势力成了中国的统治者。综观清末民初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和斗争，基本上都是在这三种政治力量之间进行的。其中，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清王朝和北洋势力之间的斗争你死我活，贯穿于始终；而资产阶级改良派则根据形势依违于两者之间。资产阶级改良派是站在清政府和北洋势力一边，还是站在资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对清末民初政局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辛亥革命的成功、二次革命的失败、护国战争的胜利，

都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从分裂走向联合、又从联合走向分裂、再次从分裂走向联合的态势不无关系。

如果说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清政府和袁世凯的北洋势力这三种政治力量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构成了清末民初历史脉络的话,那么,清末民初历史的主线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一是从改良走向革命;二是从君主立宪走向民主共和。戊戌变法是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但它失败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戊戌六君子”的被杀,证明改良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革命于是成了历史的选择。然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除孙中山、黄兴等少数“先知先觉”者外,包括梁启超在内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其他社会精英对此并无认识。相反,他们认为只要推动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革,实行君主立宪,中国就有可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成为文明富强的国家,而革命会造成“横尸遍野,血流成河”,造成社会的动乱。所以,当清政府实行“新政”,尤其是宣布“预备立宪”后,他们为之欢欣鼓舞,并积极为“新政”和“预备立宪”出谋划策。然而事实则告诉他们: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是清政府面临巨大的外在压力而被迫采取的“自救”措施,其目的是要维护和巩固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所以,它对于以改革兵制、改革学制、奖励工商为主要内容的“新政”还能有所推行的话,那么,对于预备立宪从一开始就阳奉阴违,拖沓敷衍。它不仅在宪政制度上选择的是保障“君上大权”不受侵犯的日本和德国的二元君主制,不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所希望的资产阶级能够主导国家权力的英国虚君制,而且还坚持立宪要有一个比较长的预备期,把真正的立宪推到遥远的将来。为推动清政府真心立宪,加快立宪的步伐,从1909年起,资产阶级改良派联合各省士绅,连续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但结果请出的却是一个严重违背立宪精神与原则的“皇族内阁”。1911年5月,“皇族内阁”的出笼表明,清政府根本没有立宪的诚意,它只是借立宪之名,行专制集权之实。于是在严酷的事实面前,资产阶级改良派终于认识到,不推翻清王朝,中国就没有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建立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希望和可能。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向资产阶级革命派靠拢。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历史终于走完从改良到革命、从君主立宪到民主共和的艰难行程。

关于近代中国的改良与革命,这是目前学术界比较关切的一个热点问题。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人们肯定革命,而否定改

良，凡主张社会改革者，必冠之于一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大帽子。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有的人否定革命，而肯定改良，认为辛亥革命搞糟了，是“激进主义”，因而要“告别革命”。实际上，历史上的一切改良与革命，都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肯定或否定。近代中国的改良情况就非常复杂，其中既有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和领导的政治运动，如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以及20世纪初的立宪运动，又有社会上的一些有识之士倡导和参加的社会改良运动，如“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等运动，还有统治阶级出于自救的目的而采取的一些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如19世纪的洋务运动，以及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这些不同类型的改革，其社会作用 and 意义不尽相同。就《走向共和》所涉及的19世纪末的戊戌变法和20世纪初的立宪运动而言，戊戌变法是旧民主主义时期资产阶级领导和发动的两件大事之一（另一件大事是辛亥革命），其历史意义应充分肯定。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它虽然失败了，但作为救亡爱国运动和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它不仅没有失败，而且对中国民主化进程、对社会进步和思想文化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立宪运动，领导者虽然也是领导戊戌变法的梁启超等人，但由于时移势易，尽管有它的历史合理性，也对宣传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思想和政治制度起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这时历史的主题已不是立宪，而是革命，所以它的社会作用和意义不可能与戊戌变法同日而语，更由于它与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和发动的反清革命处于对立的地位，而当时革命已成为历史的选择，因此它的负面意义可能更多一些。至于辛亥革命，它并不像有的人所说的那样是少数人鼓动起来的，而是当时中国各种矛盾（如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清朝满族贵族和汉族人民的矛盾、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群众的矛盾等）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清朝统治者对预备立宪的阳奉阴违和铁路国有政策的出笼，更加速了辛亥革命的到来。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是它的历史意义。当然辛亥革命也有它的局限性，但其历史意义是主要的。总之，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改良与革命，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改良对推动社会变化和进步有它的积极作用，我们应予以充分肯定，然而当改良已走进历史的死胡同，而革命成了历史选择的时候，再过多地肯定改良，则是对历史的误解。“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但革命的发

生，有它的历史根据，只有条件成熟时它才会爆发，人们并不能“为所欲为”。同时，我们也应看到，改良与革命既相互对立，又彼此依存。改良往往为革命准备条件，而革命又往往推动改良的进行。比如，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不少人认识到改良的路在中国走不通，于是投身反清革命；清末新政中编制的新军，后来成为辛亥革命的基本力量之一；清末派遣的留日学生，不少人成了革命党人，如此等等。同时，也正是面临反清革命的巨大压力，清政府才不得不宣布预备立宪，许诺进行政治改革。有人说不爆发辛亥革命，预备立宪可能成功。然而事实却是：没有反清革命的强大压力，就不会有1906年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宣布。

我认为《走向共和》对清末民初的历史脉络和主线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它的剧情主要围绕这一时期三种主要政治力量（即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清政府和袁世凯北洋集团）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以及从改良走向革命、从君主立宪走向民主共和的历史过程而展开（当然它也涉及清政府内部的斗争，如“丁未政潮”，涉及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内部的分歧）。尤其是它以“走向共和”为全剧的剧名，比较形象地揭示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以魏源、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为了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艰难历程。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是为了追求故事情节的好看，把慈禧塑造成“优秀的政治家”的形象（见下一节），该剧比较多地把镜头聚焦于清政府，聚焦于慈禧，对清末新政、预备立宪、清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甚至对慈禧的起居玩乐也有较多的反映。而对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活动，特别是它们之间的分（分裂）合（联合）关系则表现得不够充分，比如资产阶级立宪派发动的三次大规模国会请愿运动，仅用一场戏几个镜头来处理。而三次国会请愿运动的失败是资产阶级立宪派最终放弃改良立场而走向反清革命的催化剂。由于对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活动，特别是它们之间的分（分裂）合（联合）关系表现得不够充分，它虽然把握住了清末民初历史的主线，但对这一主线的发展揭示得不够深刻。

（二）主要人物的评价问题

《走向共和》中有名有姓的人物上百，但精心刻画的只有四个，即李鸿章、慈禧、袁世凯和孙中山。如何评价他们，首先就涉及评价历史人物

的标准问题。只有标准正确，才能正确评价他们的功过是非。那么什么是正确的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呢？我认为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是把历史人物置于他所处的社会时代之中，看他的活动在多大程度上顺应或满足了当时社会的发展趋势或需要。因为任何历史人物，都是一定的历史时代的产物，离开历史人物活动的时代条件来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人物的一切思想和活动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评价其功过是非也就失去了科学的依据。

就近代中国而言，社会的发展趋势或需要有二：一是民族独立，使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下解放出来；二是社会进步，实现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变，这既包括从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向近代的民主政治制度的转变，也包括从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向近代的资本主义工业经济的转变，即所谓“近代化进程”。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相依相存，民族独立是实现社会进步的保障，而社会进步又是实现民族独立的前提。在中国近代史上，凡是对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起过积极作用的历史人物就应肯定，反之，则应否定。同时，每一个历史人物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活动以及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应该分阶段给予不同的评价。比如，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他们在戊戌变法时期和 20 世纪初的活动以及所起的作用就不完全相同，戊戌变法时期他们是中华民族的“先知先觉者”，他们发动和领导的维新变法无论是对民族独立还是社会进步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到了 20 世纪初，他们仍然坚持保皇的立场，反对反清革命，就从中华民族的“先知先觉者”成了“后知后觉者”，至少不能算为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了。当然我们在分阶段评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的同时，也要考察历史人物的一生活活动，将功过分出主次，从而看他的一生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这也就是分阶段评价与综合评价相结合的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

如果以上述评价标准和方法来评价李鸿章、慈禧、袁世凯和孙中山，我们可能会得出与《走向共和》不完全相同的结论。首先，我们来看李鸿章，这也是目前学术界争论较多的人物。李鸿章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太平天国失败后，面对“内忧外患”的严重局势，为了维护和巩固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统治，他和同样靠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起家的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开始引进西方机器，兴办军事和民用工业，编制新式海陆军，派留学生去西方留学，亦即“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

程，有它的历史意义，我们不能否认。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于主持洋务运动的曾、左、李等人，只主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而反对用西方的方法，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所以洋务运动的成效并不理想，更由于洋务企业大多采用的是官办或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具有很强的垄断性，这又严重限制了民营企业和资本的发展，阻碍了社会进步。1895年北洋海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全军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对于洋务运动成效的不理想乃至失败，李鸿章负有重要责任。如果说李鸿章对推动洋务运动的兴起有功的话，那么，对洋务运动的失败他也有过，功过可以相抵。除洋务运动外，李鸿章长期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主持清廷外交。李鸿章主持清廷外交期间，先后发生过1884年的中法战争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对于中法战争，李鸿章先是主张妥协，后在中国战胜的条件下代表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新约》，使中国不败而败，当时有人把他比之为南宋的秦桧。对于中日甲午战争，李鸿章先是寄希望于西方列强的调停，而不积极备战，后虽在光绪的一再督促下，勉强派兵应战，但同时又处处保存实力，指挥进退失据，导致陆军全线战败，北洋海军全军覆灭。1895年4月，他代表清廷到日本与日本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对于中国在中法战争中的不败而败和在中日战争中的惨败，以及《中法新约》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李鸿章虽然不能负全部责任或主要责任，因为在他的上面还有清廷和清廷的实际当权者慈禧，但作为主持清廷外交、手握重兵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要负相当一部分责任。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失势，不久调任两广总督。此后他唯一值得提起的，是1901年9月代表清政府与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丧权辱国最为严重的《辛丑条约》。对于《辛丑条约》的签订，有人认为李鸿章要负主要责任，这有失公允。因为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他仅是奉慈禧之命行事而已，所以应是慈禧而不是李鸿章对此负责。《辛丑条约》签订不久，李鸿章死去。综观李鸿章一生，有功亦有过。说他是“汉奸”、“卖国贼”，有失公正，因为他毕竟与历史上的石敬瑭、汪精卫之流不同，他并没有主动出卖过国家和民族利益，以换取一己私利，但他至少不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政治家，更不是一位爱国者，不能与同样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同样是洋务运动的主持者，同样当过地方督抚和军机大臣、参与内政外交决策的左宗棠相提并论。因为左宗棠敢于反抗外来侵略，并不顾李鸿章的拆台和干扰，出兵收复新疆，挫败了英、俄的侵略阴谋。知奴才者莫如主子。